



# 古代小说探论

王猛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ese Drama Publishing House

遵义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王猛 著

# 古代小说探论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ese Dram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小说探论 / 王猛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104-03567-1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1764 号

### 古代小说探论

责任编辑: 赵成伟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天金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567-1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自其诞生以来，就有着广阔的接受场域，为社会各阶层人们所欢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小说又有其叙事策略、情节架构的文本特殊性。一般认为，通俗小说，自然是浅显易懂，人人皆晓的。缘此之故，研究小说者较多，队伍的组成近乎多元。然而，一阵“热闹”过后，人们不难发现，所研究的内容，能称得上是问题的偏少，而面目相似者却较多，一些所谓的“热点”、“新说”，未必能成立。究其原因，大半是由于知识储备有限、视野拓展不够所致。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就曾尝试古代小说的跨学科研究，且关注的作品大多在《红楼梦》等名著之外。这一做法，虽赢得不少有识者的肯定和支持，但在当时多少还是显得有点另类。我还思及清代学术与小说的关系问题，并不断沿着这一思路追索，在不同场合，时而申述这一想法。至 2009 年，为赴“海峡两岸夏敬渠、屠绅与中国古代才学小说学术研讨会”之约请，我把思考所得拟成《清代学术与才学小说的兴起》一文，且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文中主要观点，得到两岸同行的广泛认可。在我看来，要真正读懂小说，仅仅局限于字面，似远远不够，还必须挖掘出隐藏于文字背后的文化内蕴。小说家虽说大多没有功名，但正因为如此，才有可能除读“四书”、“五经”外，又接触大量释道轶闻、天文历算、医卜星象、堪舆地志、神仙方术之类的杂书。这就促成了小说内容光怪陆离、异彩纷呈的特有情状，也造就了小说“文备众体”的文体特点。小说家为其独特的生活境遇所决定，不太可能笃信某一学说终生不移，而往往是一

对所了解的知识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形成知识向度的多元化。忽略了这一点，就很难捕捉到小说的实质内容。一句话，研究者若想深入地诠释小说，必须以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作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学者王猛的《古代小说探论》一书，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约略说来，本书大致体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 一、研究视野的开阔

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眼睛若仅仅盯住一个视点，当然也能发现问题，但所得结论或难以尽如人意。考察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应该将其置于传统文化的大框架下予以考索，才能得出较为客观公允的答案。王猛君在研究神魔小说时，所关注的并不是该类小说中某一独立的个体，而是将其放在由“神话”至“神怪”再到“神魔”这一承接、嬗变的文化发展长河中予以观照，还就其中所蕴含的侠义文化、人生礼仪作了有意义的搜剔，深刻地指出神魔小说中人物形态，“负载着古游侠的神髓”，“神魔、侠义二者的互通性，造成了神魔内质上的侠义色彩”。他们的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实际上具有与侠一样的文化心理生成机制，其行为方式是侠化的，灵魂是侠义精神”。（《明清神魔小说与侠文化》）如此一来，就将研究的视野扩展至历史的、文化的、民族心理的开阔层面，为小说发展内在理路的梳理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赋与小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作者心细如发，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它们在韵散相间的叙述体式、夸张手段的运用、篇末寄讽的文体特征诸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存在“同体共生”的现象，进而从赋这一文体的辐射力、渗透力的角度，就文人的“诗赋情结”与小说形态的构成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表述得很有特色。（《赋与古代小说关系探析》）

### 二、选取角度的新颖

通俗小说作品，至今尚流传世间者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也当在一千五百种上下。面对如此众多的小说作品，究竟如何研究，无疑是摆在每一位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我身边的研究生，常常抱怨论文题目不好捕捉，或言被别人抢先下了手，其实，这

还是知识积累不够的缘故。我在教学活动中经常跟他们聊及，每一门知识，都好似一堵“墙”，当你掌握了这门知识后，“墙”也自然不复存在。这时，你才会发现，“墙”那边别是一番风光。当你对相关知识了解到一定程度时，遮蔽视野的“墙”不断减少，再回观研究对象，才会产生“雪点青山云”、“风光草际浮”的感觉。王猛君之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能取得如此令人欣喜的成绩，且研究思路灵活多变，与他知识层面的延展与长期的学术积淀有关。他论及小说创作史上的种种现象，往往不断调换研究视角。如研究才子佳人小说，就注意到元明言情剧对它在美学追求、人物塑造、创作方法诸方面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并进而意识到，才子佳人小说，是“文人群体心理的外化”。此类小说家，“既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萌芽时带来的新的意识，又不可能完全突破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所以当他们以心灵发泄方式进行创作时，主题的反映必然是矛盾而复杂的”。（《元明言情剧与才子佳人小说》）使论文对该类小说的内容把握具有了应有的深度。又如，在探索晚明冯梦龙的妓女观时，作者没有像一般论者那样，仅关注冯氏之代表作“三言”，而是从其所编《挂枝儿》入手，将二者对照研究，捕捉冯梦龙思想、心态如何由盲目、狂热变得冷静、清醒，并追索其演变原因。如此之类，皆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 三、理论阐释的精到

王猛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除了阅读大量的古典文学文献外，还如饥似渴地接纳国内外相关理论著述，并尝试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剖析文学现象。我在课堂教学、作业批阅中，发现了这一苗头，立即加以鼓励，后来确定以《明清神魔小说的文化观照》为他的学位论文题目，主要也是为了发掘其这方面的潜能。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幸得到沈伯俊、项楚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这一优势得到了更好发挥。明清小说序跋研究，是近几年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然由于序跋产生时代不同，作者又来自不同的生活层面，对小说文本的解读及小说家创作心理的把握，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态势，梳理起来殊为不易。王猛面对这一棘手话

题，却能知难而进，锐意探索，由他主持申报的《明清小说序跋研究》，刚刚获批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立项资助，正体现了学界对其研究思路的认可。就“世说体”小说而论，自《世说新语》之后，历代皆有拟作，以至形成“世说体”系列。此类小说，恐不下几十种。前些年，我给研究生上课时，曾建议他们以此为学位论文题目，作点系统研究，然终因畏难，无人愿意承担。后来，倒是我早年的一位已是教授的学生，乐意对此作些研究，几次就细节问题向我请教，申报并获得了教育部立项资助。王猛的论文，也涉及“世说体”研究，他在论及明代“世说体”小说时称：“明代‘世说热’的产生，是‘晚明’、‘魏晋’两个朝代‘时空’近似、精神相通的产物。序跋体现了二者在时代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同时也折射出差异和变化。众多为清言辩护、歌颂的序跋反映了世说精神的延续。”（《明代世说体小说序跋论略》）所论见解独到，耐人寻味。

王猛具有敦朴诚实、坚忍不拔的个性，对父母、长上尊敬有加，对同学、朋友真诚相待。无论外界有怎样的诱惑，他仍能埋头读书，矢志向学，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人文理想和学术追求，殊为不易。他不善言辞，更不愿刻意表白自己，然胸藏珠玑，长于思辨，默默耕耘，努力进取。古代学者，“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发现并搜剔“隐在书缝中”的学术论题，并时有所得。王猛踵前人之迹，正积极从事着这种从“书缝中”、“空白处”搜索学问的有意义的工作。孙楷第先生曾称：“真积力久是学，心解神契是识，诠叙有方是才。议论正则德也”，给后学以颇多启示。做学问应该具备这种细心与识见、毅力与坚持。期待王猛君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不断开拓新局面，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

赵兴勤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彭城凤凰山东麓倚云阁

## 篇幅三

## 目 录

## (一) 神怪篇

三教合流与神魔小说 .....	2
明清神魔小说与侠文化 .....	12
神话与神魔小说 .....	21
“神魔小说”正名	
——对欧阳健先生小说类名辨正的不同认识 .....	33
神魔小说与人生仪礼 .....	42
六朝志怪的小说性新论 .....	50

## (二) 三国篇

从诸葛亮的隐士心态看三顾茅庐 .....	60
主张实录还是认同虚构	
——对嘉靖本壬午本《三国演义》序、引误读的还原 .....	67
《三国演义》对英雄母题的利用与超越 .....	73
“凡三往，乃见”质疑 .....	83
亦正亦邪话曹操	
——不同视界中的曹操形象解读 .....	85

### (三) 世情篇

《封神演义》对儒家五伦的消解与重构 .....	92
《金瓶梅》与明代社会的金钱观念 .....	101
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中的因果报应观念 .....	109
元明言情剧与才子佳人小说 .....	118
《挂枝儿》：冯梦龙“另类”的妓女观 .....	129

### (四) 序跋篇

明代世说体小说序跋论略 .....	138
明代“剪灯”系列小说序跋与小说生态环境的考察 .....	149
学术思潮嬗变与明代小说序跋 .....	159
《平妖传》张无咎序蠡测 .....	169

### (五) 其他

赋与古代小说关系探析 .....	176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著者为冯梦龙考 .....	187
四大名著中的教育理念及其启示 .....	193
后记 .....	199

(二) 神怪篇

## 三教合流与神魔小说

三教合流是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唐宋以降，尤其明代以后，儒佛道三教在长期的争斗与互纳后，最终相辅而行于世，三教合流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趋向，并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而深入人心。产生于明清时代的神魔小说，无疑会受到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其影响之大，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部神魔小说，即便是仙佛传记类作品，也不可能完全受某种单一的宗教观念支配，它们均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三教混一的痕迹。三教中尤其佛、道与神魔小说渊源甚厚，前人多有论及，如佛道对形象原型的提供、时空境界的拓展，以及佛道观念、宗教文化精神对小说结构、题旨之功用等等，其间不乏精辟的言论；而三教合流作为明清时代文化潮流之重要趋向，使三教的教义理念以杂糅形式存在，其对神魔小说的影响，却述及不多，本文拟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是以儒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具有恒定性的整合构架。三教互补，遵从共同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功能指向，这一点与西方不同。欧洲从公元四世纪初，古罗马帝国就以基督教为国教，排斥其他宗教为“异教”。基督教一尊天下的地位，使其与政权组成宗教史上特有的政教合一特征，中世纪的欧洲人并无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宗教史上的三教合流，应该源于东方文化特有的兼容精神及中国文化强大的吸附功能。佛教一开始

传入中国，便依附道教流传，以致人们误以为佛教为道教方术之一种。佛教的自我改造性极强，它早早地就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引进来，三国时的康僧会就说：“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六度集经·戒度无极章》）又断言：“布施一切圣贤，又不如孝侍其亲。”（《六度集经·布施度无极章》）佛教从不与儒教争本末，道教则不然，作为本土宗教，又因为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一度想与儒教一分天下。如《抱朴子·内篇·明本》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但道教也不根本排斥儒教，相反却积极吸纳了儒教忠孝等伦理观念，所以葛洪在《内篇·对俗》中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三教的大致和平共处，首先与历代帝王推行的三教并举的宗教政策有关，历史上虽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但其毕竟是少有的例外。如梁武帝虽迷信佛教，却也不废他教，曾作《会三教诗》以日喻佛，以众星喻儒、道。唐太宗虽不信佛道，认为：“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而“朕之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但他也并不排斥佛道，他说：“今李家居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对三教同样一并扶植<sup>[1]</sup>。甚至有亲自为三教定位次的皇帝，《北史·周本纪下》记载：“十二月癸丑，集群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辩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文化结构，原因在于统治者看到了儒教对稳定国家政权无可替代的文化功能，而不废佛道，则因其依附儒教衍生出的辅助、教化作用。

三教并举的政治文化结构直接导致了三教混一的心理意识结构的形成，鲁迅在杂文《准风月谈·吃教》中说：“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都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sup>[2]</sup>如白居易“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游悟真诗》），在庐山草堂上置三教经典各数卷，早炼丹，晚参禅。历史上不乏像白居易这样集三教于一身的文人士大夫，而或多或少混合三教意识、不加辨明的普通人更是数不胜数。三教合流由唐宋以后真正开始，明清时达到顶峰；至于三教

之相互容纳，则从佛教传入、道教成立，三教开始接触时就开始了。三教之互相吸纳，在三教论衡中是通过和平论争，而不是西方战争方式的形式完成的。儒教在宋，曾融会佛道，产生了新儒学——理学。道佛二教在神仙体系、理论教义、仪式组织上也互有吸纳，如道教就仿照佛教神系建立了自己的神仙谱系，佛教则吸收道教哲学的某些成分创立了人间佛教——禅宗。

如果说明清以前的合流还只是表现为一种趋势的话，那么到了明清时代则是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了。三教经过长期的争论学习，终于在心性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理论归宿，从此，无论在理论哲学层面，还是宗教神学层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祥和圆融即在于此。《老残游记》中的一段话说得好：“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第九回）但是，当事物在失去其鲜明的独特性的时候，其存在的依据也在减弱乃至消失，明清时代佛道二教便开始进入了衰落期，而儒教即使有统治者的尽力扶持，也已是强弩之末。

“鬼神信仰的世俗化，说明了鬼神信仰的没落。”<sup>[3]</sup> 佛道二教的衰落并不等于销声匿迹，而是逐渐民间化、世俗化。实际上，道教本来产生于民间，佛教进入中国，先依附上层，后来为扩大影响，便转向民间，世俗化也从未间断过。不过由于前期佛、道教优秀人才辈出，钻研探讨教义理论蔚然成风，二教始终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三教完成合流之后，理论上好像走到了尽头，更由于此时缺乏创新人才、杰出的宗教人物，再加上统治者相对的冷落，二教开始向下层降落，逐渐被实用理性化，乃至被用来当做谋生敛财的工具。道场法事、斋醮祈禳一片兴旺。《后西游记》就描写了道士宣淫、沙门敛财的衰败景象，如第五回法门寺众僧以果报说法骗人布施，以至“钱财山积，米谷川来，金玉异宝，视如粪土，绫罗锦绣，只作寻常”。正如猛醒庵的老和尚所说：“……为性命真修者少，贪善名假托者多……还有一等不肖的和尚，满口胡柴，充作高僧登坛说法，哄骗得愚夫愚妇金钱贡献，奔走如狂。还有一等痴心的和尚，一窍不通，寸善未立，妄想成

佛作祖……还有那些焚顶燃指，沿街绕巷，敲梆撞钵要求布施的，一时也说他不尽。总之，贪嗔痴欲，奸盗诈伪，无所不有。遂将我佛清净法门，慈悲愿力，弄做个口舌是非之场，万恶逋逃之薮。”正因如此，观音才派唐半偈、孙小圣等师徒再上灵山，求得真解，以期重振佛门。

## 二

三教合流加剧了佛道世俗化、人间化，不仅为神魔小说提供了直接的题材、素材，而且从创作主体到创作客体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使神魔小说呈现出恢弘阔大、异景迭现的状貌，刺激了神魔小说的繁荣、延续。

首先，从创作主体——小说的作者一方观照，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儒者，很多人以学儒开始，后来便出入佛、道。如《封神演义》的作者陆西星（一说许仲琳），就弃儒服而就黄冠，是正德年间有名的道士；《西游补》的作者董说“十岁能文，十三岁入泮，十六岁补廪”（《甲申朝事小纪》），少年时便随父游佛寺、谒名僧，顺治十三年，正式到灵岩山做了和尚。其实，这样正式身份的僧、道小说家并不多见，很多的作家是以儒者的身份秉承了宗教的意识，如邓志谟写了三部道教小说却并非道士，不过是笃信道教思想而已。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三教义理的可交际性，不少作家同时兼信三教，不过有所侧重而已。甚至有人三教意识处于混一状态，连本人也未必分得清，当然在生活中也没有分清的必要，很多神魔小说中儒释道意识杂糅即是明证。总之，作家思想意识的三教合一性，必然产生作品思想形态上的三教合一的特点。

因为并不笃信某一宗教，作家的创作意识便不受某一宗教教义教规的束缚局限，就能以一种超越的自由心态进行审美创造。然而，“超宗教并非无宗教，而是吸收宗教的智慧加以点化，在跳出宗教的藩篱中拓展主题的审美思维空间”。<sup>[4]</sup>主体意识的丰富性、超越性，一方面造成了创作时的无拘无束，乃至可以张冠李

戴，直接产生一切宗教为我所用而非为宗教做笔奴的自由创作心态；另一方面，由于超越于各个宗教之上，不为所限，便极量地放大了中国人对神佛虔而不恭的文化态度，喝神骂佛，拿神佛开涮等，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艺术作品行文风格的诙谐风趣，像《西游记》嘲佛弄道实源于此。

其次，作品形象塑造具有三教混一意识特点，很多形象是这种意识的产物。“明清以后，佛教与思想界日见疏离，僧团信仰与修习仪轨高度世俗化，日趋向道教和民间宗教靠拢。如原属道教信仰体系的关帝庙搬进了佛教殿堂……”<sup>[5]</sup>而同样，道教将佛教神抬进自家大门更不鲜见。神魔小说处于如此的文化氛围中，要想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神魔小说作品中幻化形象群体分佛教人物、道教人物（包括作者杜撰的道教形象）及民间俗神三类，由于民间神祇多被道教神系吸纳，所以说其形象序列多不离佛道，且这些形象往往角色混杂，佛道（甚至包括儒）集于一身。如孙悟空的老师须菩提祖师，“菩提”是觉察、觉悟的意思，是印度佛教术语的音译，而“祖师”却是道教的说法。须菩提传授石猴的并非佛门大法，而是金丹大道，至于其夜授玄机的情节，显然是仿五祖传法慧能的家数。由此看来，对佛、道两家，作者是随意遣用、无所顾忌的。再如《咒枣记》中的萨真人，修道时念的是《心经》，翁道人教其咒枣之法，密语却是佛、道话语的粘合（第三回）。《北游记》中的真武祖师因关羽沙刀作怪，危害人民，便召请关羽，而关羽迷惑听讲佛法，如来道：“上帝乃玉帝一魂化身，因贪心不了，而堕下凡间，今已复回金身。汝乃臣子，他乃主，主欲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他今既来，安有不去之理？”这里佛祖竟然口吐腐儒之语，显是作家三教混一意识的产物。总之，无论是哪方人物，其言语、行为、外貌等各方面均不可能脱离三教合流的社会心理意识的影响，这是此种文化语境之下神魔小说独具的效果。

第三，从作品内容上来看，三教合流的文化影响更为明显，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很少能见到所谓崇佛抑道或尊道排佛之类的题旨，原因在于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文化构架已牢固地建构在

中国古人的心灵之中，形成了“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的三教互补格局。“对广大民众来说，一般人并不执迷于某一宗教，而是游移于三教之间，或集三教信仰于一身，使之在处世、立身、修心上各发挥各的作用，互补互偿。”<sup>[6]</sup>即使对于神魔小说的主体作家——众多中下层文人来说，他们可能偏重信奉某一宗教，但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其话语形式不可能逃逸三教合流的整体构架，绝不会因为一种宗教而完全排斥另一种宗教。像《西洋记》、《西游记》，有人认为具有明显的扬佛贬道倾向，<sup>①</sup>这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我们不能断章摘句，而应当辩证地、整体地观照作品来确定作者的价值取向。先看《西洋记》，代表道教的张天师与代表佛教的金碧峰相比，的确较逊一筹，但是不能否认，前者同样是西征途中的重要人物，他一路上冲锋陷阵、降魔捉怪，从不退缩，立下赫赫战功，后与金长老一起被皇帝封赐。而金碧峰尽管法力无边，可也时时遭难受挫，撒发国金毛道长的金星旗，乃玄门至宝，只要磨动即可变换世界，金碧峰对之便显得束手拘脚。再有，金碧峰作为协助郑和征西的第一号人物，并没有完成取宝重任，以至在酆都国，被阎王讥为“半途而废”，感到“如负芒刺”。再有，金碧峰乃燃灯古佛下凡，是佛门腕字号人物，而张天师不过道门中普通成员，二者悬殊明显。具体描写中，有时候作者可能对笔下某些人物有所偏向，但这种对个别成员的偏向不可理解为对整个宗教的偏向。因此，说《西洋记》扬佛或有几分道理，说贬道则缺乏充分的根据，用鲁迅的话说：“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糊的彼此之争……”（《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既是“含糊的彼此之争”，何来扬与贬，尊崇与排斥呢？

再看《西游记》，第一至七回为全文最精彩的部分，其中张扬的却是道家追求自由、平等的文化精神。书中充满了道家术

<sup>①</sup> 毛忠贤，《西洋记》的主旨及其与明代神魔小说中的扬佛贬道倾向[N]. 宜春师专学报，1988 (1).

语，甚至佛门弟子唐僧也不时口吐玄词。像第三十三回“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身”，一望即知为道家吹嘘；第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谈诗”，说的全是道家的一套。当然，由于作品题材本身的佛教性质，崇佛的语词、情节不可能不存在。而很有反讽味道的是，嘲佛的情节同样存在，如佛祖对勒索人事行为的护短，佛菩萨的纵妖害民，悟空骂如来“妖精的外甥”、咒观音“该一世无夫”等等。一切只能这样理解，即，作者的创作心态具有超越任何一种宗教的非功利指向，或者说作者的态度是三教合一式的，正如第四十七回悟空劝告车迟国王：“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证你江山永固。”

神魔小说内容上的兼容三教，并不等于每部作品都是平分秋色，大致仍以儒为核心，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所决定的，即使在一些偏于扬道或扬佛的作品中，儒仍是一切的根基、意旨所在。传统文化以儒为主的结构格局在古代中国很早就已确立，儒文化的伦理性质与封建宗法的政治结构具有天然的同构性。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五记载这样一件事，元末的一位皇帝问一翰林学士：“三教何者为贵？”答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其解释是没有黄金白璧活得了，五谷则是一天少不得。这个故事说明了封建社会儒家不可动摇的主体文化地位。因此，佛、道的生存发展必须以向儒家靠拢作为前提。佛教的中国化、佛道的世俗化过程，根本上就是儒化、伦理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神魔作品的题旨，儒教是骨，而佛、道再丰满也不过是附在骨上的血肉。《封神演义》以极量的篇幅宣扬道教神通法力，而阐截二教的争斗，实在是为商周政治斗争服务的，表现的是作家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西游记》的宗教气味很浓，可是孙悟空的进取、奋斗精神，其仁心爱物、救民安国的思想意识仍是儒家的。《韩湘子全传》蔑视功名富贵，宣扬人生如梦，有人认为是宗教小说，但第十三回在韩愈筵前，当湘子诗斥诸大臣：“衮衮公侯着紫袍，高车驷马逞英豪。常收俸禄千钟粟，未除民害半分毫。满斟美酒黎民血，细切肥羊百姓膏。为官不与民方便，枉受朝廷爵禄高。”这种干预现实的愤激之词，显